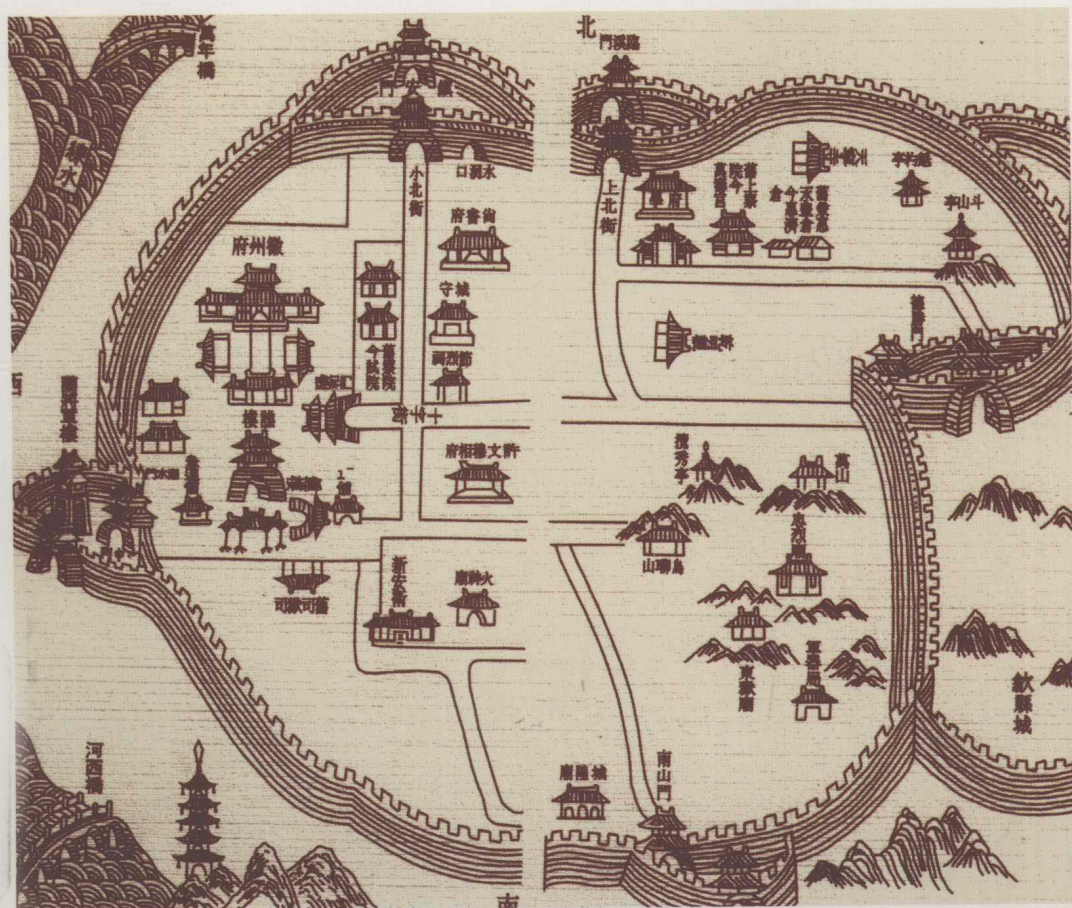


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

歙縣方氏的個案研究

(中文修訂版)

朴元煥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

歙縣方氏的個案研究

(中文修訂版)

朴元燾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歙縣方氏的個案研究（中文修訂版） /
朴元燬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004-800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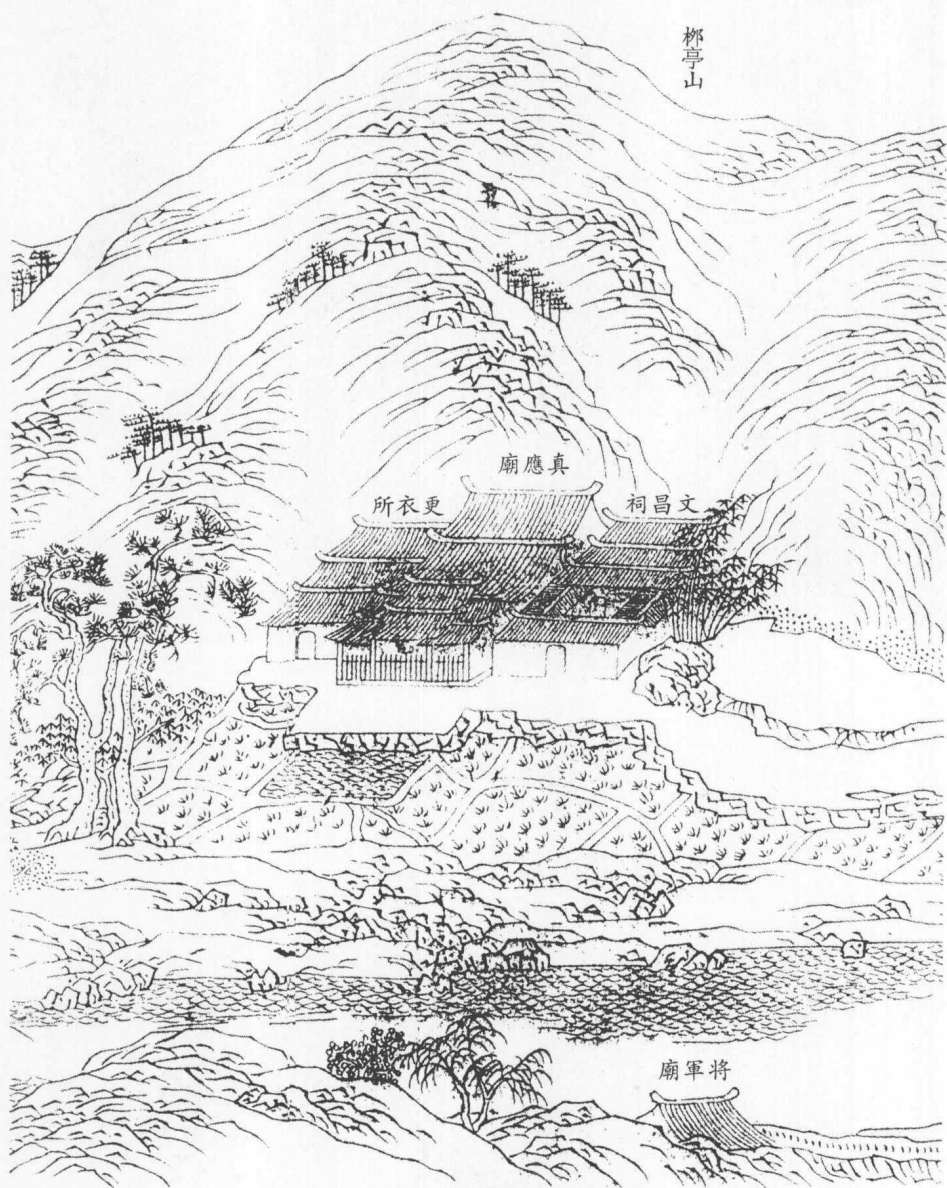
I. 明… II. 朴… III. 氏族谱系—研究—歙縣—明清时代
IV. 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953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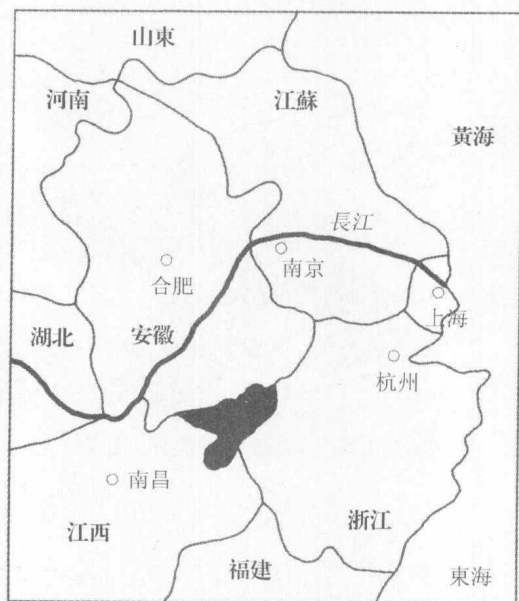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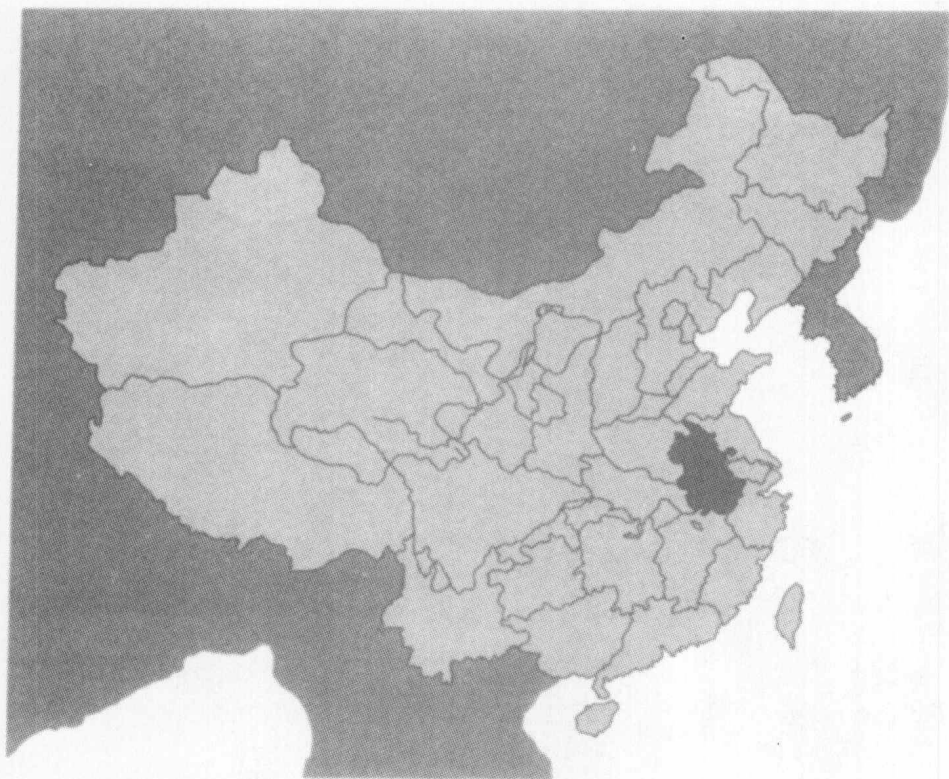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张小颐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木子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新魏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10
字 数 248 千字
定 价 43.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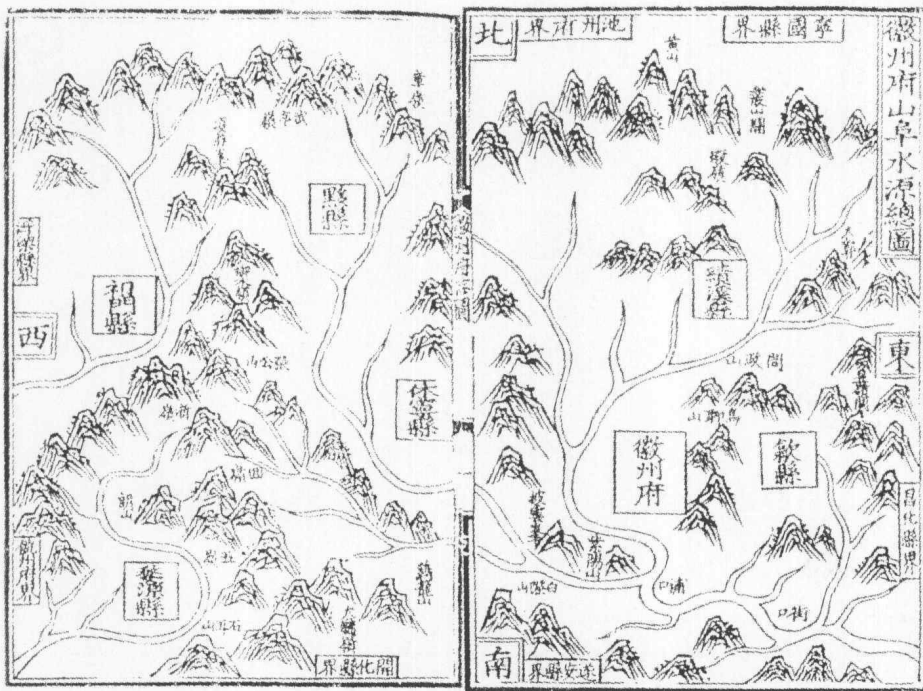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柳亭山圖 乾隆《方氏會宗統譜》卷18



安徽省 徽州府 位置圖



徽州府圖 弘治《徽州府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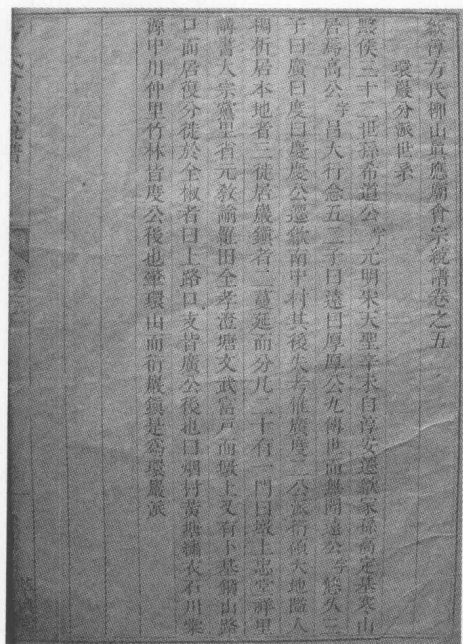
歙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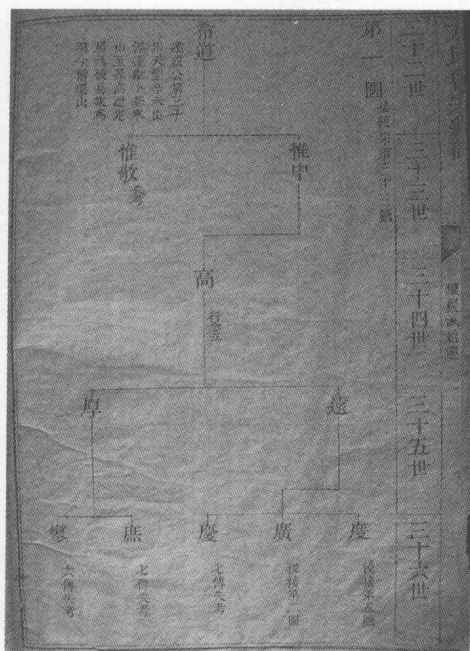
方紘像
康熙《歙縣環巖派方氏族譜》卷一



方儲像
康熙《歙縣環巖派方氏族譜》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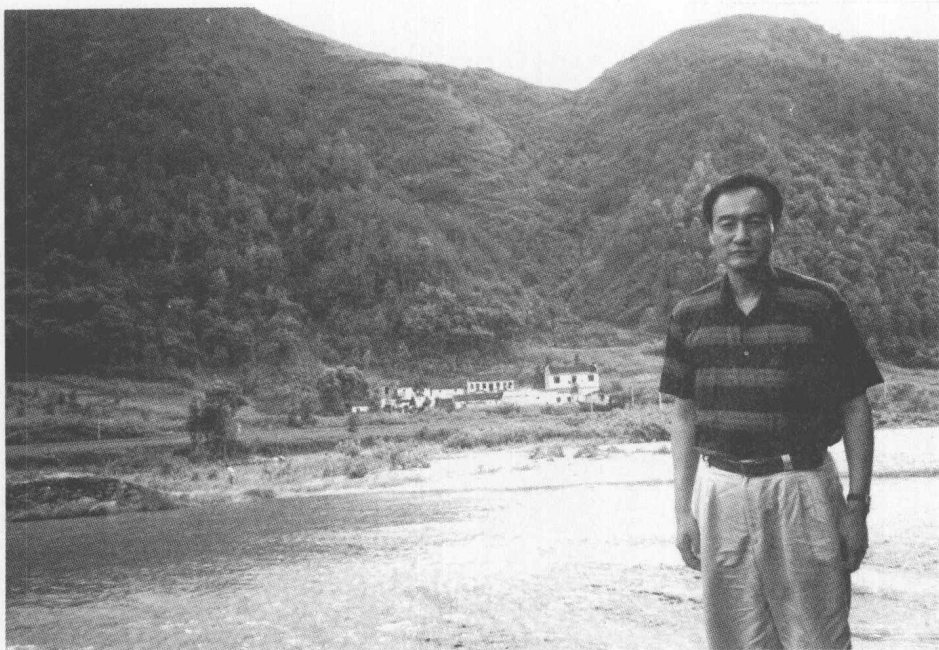
環巖派 乾隆《方氏會宗統譜》卷之五



環巖派世系 乾隆《方氏會宗統譜》卷之五

鋼山路口方氏支譜序 宿字號
 彛等不列陰事將失據肝蠻不
 昭陽事將失據而錫弁閥衍統
 陰陽而胥治之則譜牒重焉譜
 學之興推輪于世本而四庫書
 目宗文總目所載無慮數十百

《鋼山路口方氏支譜》
 清乾隆十一年（1746）觀禮堂刻本



作者在歙縣柳亭山真應廟址前（1996.7.7）



淳安縣光昌鄉富山村方氏家廟之懸板



原柳亭山眞應廟址的农家



原柳山方氏礐溪派成性祠改造的礐溪小學

中文修訂版序

我對明清時代徽州宗族的興趣始於 1993 年，當時，作為北京大學的訪問學者，我希望為研究明清社會史找到一個新的主題。在北京逗留的一年期間，我不時進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徽學研究中心，同周紹泉、樂成顯、陳柯雲等幾位老師進行交流。後來，接受這幾位老師的建議，我參加了在徽州（如今的黃山市）舉辦的“全國徽學學術討論會”。會議期間，我們參觀了徽州的歷史古跡，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聚族而居”的鄉村內，大大小小的宗祠隨處可見。這從視覺上告訴我們，明清時代宗族制的盛行。

回到北京，那些再現明清社會的徽州鄉村住宅和街頭小巷仍然令我念念不忘。在歐洲歷史上，越是接近近代，血緣組織及其社會功能越是弱化。而在中國，在商品經濟發達的 16 世紀，血緣組織為什麼反而會擴大強化呢？這一疑問始終困擾着我。而且宗族組織的擴大強化不僅出現在 16 世紀的中國，在朝鮮，稍晚些時候也發生了同樣的現象，這一事實更激起了我的研究熱情。從這一疑問出發，剛好當時我又有幸得到了《方氏會宗統譜》的副本，就不知不覺開始了明清宗族史研究，從此欲罷不能。

我的目標是通過對歙縣方氏深入的個案研究，探討至今為止所揭示的有關宗族制度的學說。即用微觀的方法分析某個特定地區和宗族，將個案研究結果與宏觀考察整個中國社會所得的諸多結論相比較。這一研究始於 1993 年，我的第一篇論文於三年以後即 1996 年正式發表，刊登在韓國《東洋史學研究》第 55 期上，題

目為《明代擴大徽州宗族組織的契機——以歙縣柳山方氏為中心》。

韓國的中國史學研究難以與中國相提並論，就是與日本相比，研究人員也是為數甚少，而研究與本人同一時代類似主題的學者更是不得一見。因此，中國歷史的研究成果很難在韓國的中國史學界得到有益的批評或反響。再者，外國學者偶然發現感興趣的論文題目，卻限於語言障礙，無法閱讀論文的具體內容，也是深感遺憾之處。

因此，我曾多次將階段性的研究成果譯成中文，發表在中國的學術雜誌上。之所以不選擇英文或日文，是出於研究中國的學者可能不懂英文或日文，但不存在不懂中文的中國學研究學者這一判斷。我的第一篇漢譯論文《從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組織的擴大》刊登在《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上，後來被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發行的《複印報刊資料（明清史）》（1997年第2期）全文轉載。圍繞着柳山方氏，我共有六篇論文翻譯成中文，陸續在中國學術雜誌上刊發，而且研究主題具有連續性，其目次如下：

1. 《從柳山方式看明代徽州宗族組織的擴大》，《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1. 《從柳山方式看明代徽州宗族組織的擴大》，《複印報刊資料（明清史）》1997年第2期。

2. 《明清時代徽州真應廟之統宗祠轉化與宗族組織——以歙縣柳山方氏為中心》，《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1. 《明清時代徽州真應廟之統宗祠轉化與宗族組織——以歙縣柳山方氏為中心》，《複印報刊資料（明清史）》1998年第6期。

3. 《方仙翁廟考》，《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4. 《明清時代徽州商人與宗族組織——以歙縣柳山方氏為中

心》，《安徽師範大學學報》1999 年第 3 期。

4—1. 《明清時代徽州商人與宗族組織——以歙縣柳山方氏爲中心》，《'98 國際徽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 年。

5. 《明清時代徽州的市鎮與宗族》，《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5 年 1 號。

6. 《明代中期的徽州商人方用彬》，《徽學》2004 年號。

我計劃在這六篇歙縣方氏研究論文的基礎上出版單行本，並譯注《方氏會宗統譜》中《歙縣柳亭山真應廟紀事》等基礎史料，以使研究內容能與史料進行直接對照。同時，爲了介紹明清時代的中國族譜，我曾在《韓國史市民講座》第 22 號發表《明清時代的中國族譜——以〈方氏會宗統譜〉爲例》一文，對《方氏會宗統譜》作了專門探討，因此，單行本中增加了這一部分內容。

除此之外，我還將研究中的實地考察記錄整理成了三篇“研究紀行”，刊載於韓國學術雜誌《明清史研究》，其篇目爲：

《徽州紀行》1997 年第 7 輯。

《探訪歙縣柳亭山真應廟——再訪徽州》1998 年第 8 輯。

《探訪歙縣方氏族譜——三訪徽州》1999 年第 10 輯。

在這裡，我將這三篇“紀行”也譯成漢語一並收入。

2002 年，我曾將上述有關歙縣方氏研究的文章集結成書，在首爾出版，名爲《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後來，隨着這部韓文著作的流傳，中國學者唐力行教授（上海師範大學）和常建華教授（南開大學）因熟悉書中論文的内容，發表了《國外新書評價：朴元燾〈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唐力行，《歷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朴元燾〈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常建華，《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05 年第 2 期）兩篇書評，對我的徽州宗族研究進行了綜合評述。此後，韓中兩國的一些親朋好友多次提議，希望我藉此機會將《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譯成中文出版，因爲中國學者對這部著作的關注勝過了韓國。

4 中文修訂版序

雖然這些論文刊登在中國學術雜誌上時已大致完成了中文翻譯，但出版中文譯本，還需要完成註釋整理等一些繁瑣工作。從2008年年初開始，我即致力於準備《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一書的中文出版，但其間多次因事耽擱，現在，終於可以在新的一年進行收尾工作。非常感謝在此期間為本書翻譯發行不辭辛勞的于心華教授（韓國，亞細亞聯合神學大學）、權仁溶教授（高麗大學亞細亞問題研究所）、阿風老師（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楊艷秋老師（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同時，也向給予本書出版大力支持的張小頤編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致以衷心的感謝。

朴元熇

2009年2月18日書

韓文版序

作者開始從事中國歷史研究時，還處於冷戰格局下，所以很長時間內韓國學者不能前往中國大陸，而祇能去臺灣或香港從事研究。1989年，我經由香港，終於首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我訪問了北京大學歷史系，和當時擔任系主任的馬克堯教授、成漢昌教授見了面。經先來到此地的于心華教授的介紹，成漢昌教授像迎接老朋友一樣接待了我，並就將來彼此之間的學術交流活動作了很多探討，我感到非常榮幸。那時候如果要去中國，需要經過很多煩瑣的手續。我當時認為以後最緊要的問題是韓國的中國史研究者如何才能比較容易地經常訪問中國。我自己也想常去中國，熱切盼望和中國的學者交換意見，並去很多地區探訪考察。

1990年6月，我和高麗大學史學會的十四名會員，在北京大學參加完學術討論會後，首次探訪了中國的東北和江南地區的歷史遺跡。1991年1月，東洋史學會的五十名會員參加了在北京友誼賓館召開的由高麗大學和北京大學共同主辦的第十屆東洋史學會冬季研究討論會^①，會後，與會成員分成三路前往各地探訪史跡，再經由香港回國。作者又先後於1991年7月與高麗大學專攻中國史的十九名研究生，1992年1月與東洋史學系的二十四名

^① 這次研討會是韓國史學界的第一次中韓學術會議，學術成果由東洋史學會編輯成《中國史研究的成果與展望》一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1991年6月出版發行（ISBN 7-5004-0981-8K.130）。作者要求在書名前加上“韓國”二字，但由於當時中韓尚未建交，北京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擔心這樣做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而使此書不能順利出版，婉拒了這一提議。

學生一起，兩次訪問了北京大學歷史系，聆聽了北大歷史系教授的學術報告，並前往中國各地探訪古跡。^①在中國展開的這些古跡探訪活動，始終受到我的恩師——韓國社會科學院理事長金俊燁老師的鼓勵。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金俊燁老師就常對我們說，“歷史學是用兩隻腳來學習的”，他強調親身探訪歷史遺跡，了解地理環境，對於歷史研究十分重要。作者正是受到了老師的鼓勵後，和學習中國史的學生們，數次踏上了中國古跡探訪之路。

同時，爲了擴大韓中之間的學術交流，作者積極推動實施高麗大學與中國方面的學術交流項目，邀請中國的歷史研究者到高麗大學做爲期一學期的客座教授，也讓高大歷史系正在撰寫論文的研究生到北京大學留學一至二年。1991年9月，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張傳璽教授來到了高麗大學東洋史學系，開始了爲時一個學期的講學。這一交流計劃一直持續到現在，從未間斷^②。韓國的研究生到中國的留學計劃自1992年以來也一直持續。這樣一來，高麗大學和北京大學兩校之間的史學交流開始步入了正軌，和中國大陸長期斷交而形成的“學術交流的渴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解。

1992年8月，中韓兩國正式建交，我獲得了韓國教育部“大學教授海外派遣”項目的支援，於1993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作了一年的研究。在此期間，我參加了8月在西安舉辦的第五屆明

① 兩次討論會的成果在1992年12月由高麗大學出版部出版發行，書名爲《中國的歷史和文化》。

② 自1992年的第2個學期北京大學的張傳璽教授講學後，先後有吳榮曾（北京大學）、吳宗國（北京大學）、王天有（北京大學）、林華國（北京大學）、徐萬民（北京大學）、徐凱（北京大學）、祝總斌（北京大學）、張希清（北京大學）、王曉秋（北京大學）、朱維錚（復旦大學）、王小甫（北京大學）、樊樹志（復旦大學）、岳慶平（北京大學）、吳景平（復旦大學）、周紹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王新民（復旦大學）、李孝聰（北京大學）、姜義華（復旦大學）、方德鄰（北京大學）、姚大力（復旦大學）等教授來到高麗大學東洋史學系講學。